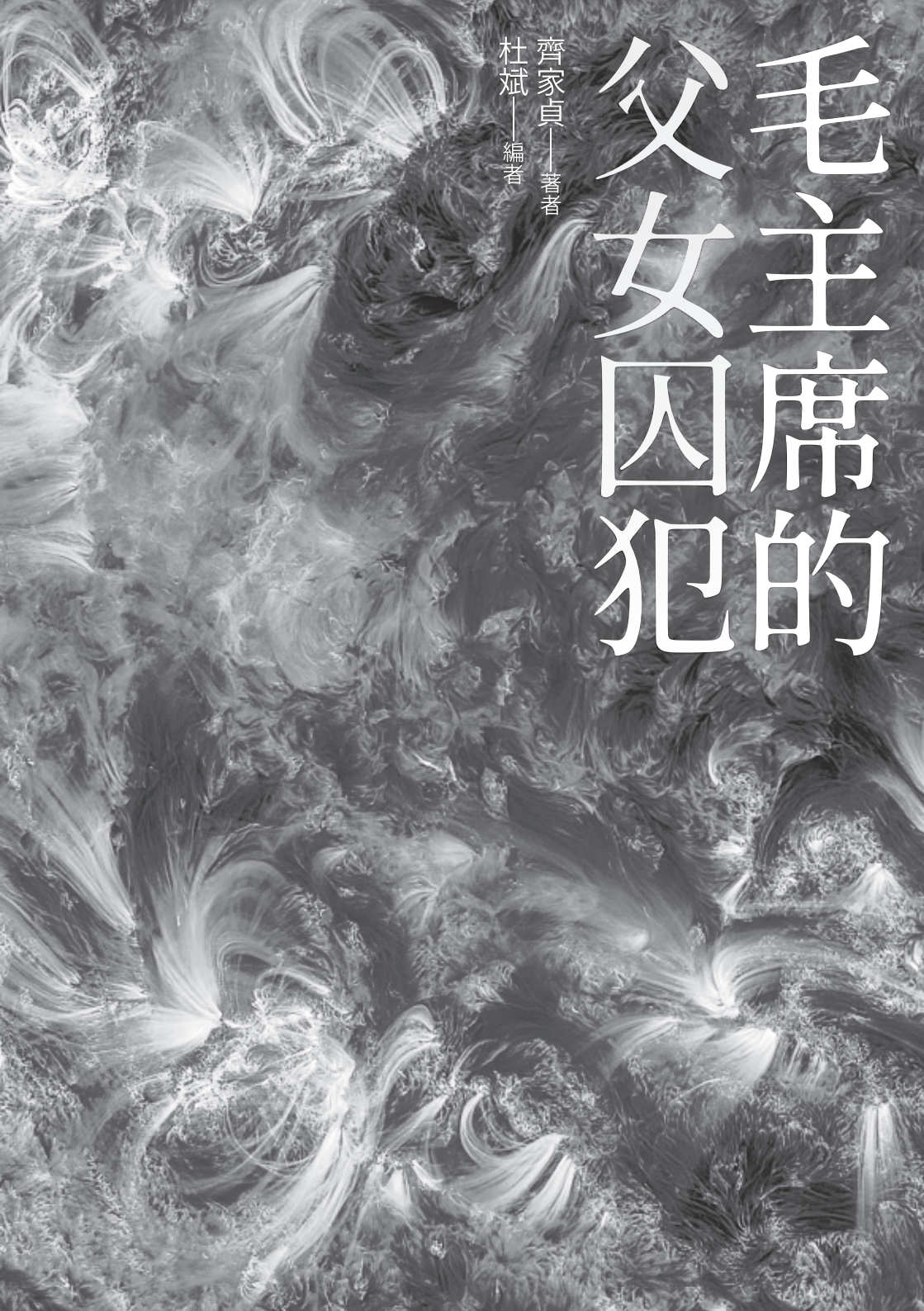


毛主席的 父女囚犯

齊家貞——著者
杜斌——編者



空白的誕生

後來，我一生中的每天都是戰爭。

我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緊要的那一年：重慶隧道萬人窒息死難、蘇德戰爭爆發、日軍偷襲珍珠港，以及美國、中國、澳大利亞等國向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宣戰。子彈和長程轟炸機爭食著兩條腿的生靈。

我到人間的時辰，也許是清晨，也許是正午，也許是深夜，我不知道。我的父母親也不記得了。

二戰硝煙未散，繼而中共裹挾著由蘇聯、蒙古、朝鮮、日俘組成的國際共產聯軍發動了侵華戰爭，將國民政府驅逐到一座名叫福爾摩沙的偏遠孤島。

緊隨其後，中共討伐我家：父親愛國，堅留大陸，只因是國民政府鐵道運輸高級管理人員而被誣罪遭到管制和拘役十年；母親「監外執行」二十一年，拉扯著從

十五個月大至十歲的五個兒女；高中畢業的我想探尋偷渡出國圓求學夢的途徑時，被以「叛國投敵罪」判刑十三年，還連累父親被判刑十五年；四個弟弟在社會上服著「無期徒刑」。

在餓斃數千萬人的大饑荒和血海浸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父親和我，依靠母親不間斷地送食物到監獄接濟而得以生還。四個弟弟在無數人的冷眼中度日。母親為撐起坍塌的家，傾盡了光和熱，後來力盡而死。

父親釋放回家，等待他二十一年的母親已於兩年前病逝。身心受創的父親，誓言要將亡妻放心不下的兒女們拯救到民主之國，過一下真正的人的生活。他在七十二歲時非法滯留美國打工，將我搬運到了澳大利亞。

從此，我和父親——一對心懷歉疚的「家庭罪人」，開始攜手搬運四個弟弟以及其兒女們逃亡的漫長戰爭：在世界地圖上，每條進出中國的通道都被我的雙眼看得痛不欲生。全家人在亞洲、大洋洲、北美洲之間原地疾走，直到再也無人看見過他們的身影。

父親和我，把頭顱擲向天空，踩著反彈下來的迴聲晝夜奔襲。父親疾走了二十三年，戰死。我疾走了三十四年，即將戰死。這是一場永不可能凱旋的戰爭。

在母親的墳墓裡，在父親的灰燼裡，在弟弟們的悶吼裡，在我的骨頭裡，時有哭聲傳出。

父母親的「奇緣」

我的齊氏先祖，在明末清初朝代更替時，集體從福建逃到海南島文昌縣第田村。先祖們人丁興旺，數代為官。到我父親這代時，只剩下三口之家。

父親齊尊周是家中獨苗。在上海讀書的他，體格羸弱，靠長年晨跑並洗冷水澡鍛鍊身體。高中畢業後，他在杭江鐵路局做練習生。他按順序給人生作出了一個規劃：事業，身體，讀書，家庭；並訂下立身處世的原則：「人生是給予，而不是索取。」

父親勤奮工作，深受副局長謝文龍賞識。當交通部提拔謝擔任津浦鐵路運輸處長時，父親跟隨他，去做了一名列車巡檢員。二十歲的父親，在第一本日記的扉頁上寫道：「他（謝文龍）正是我想追隨並士為知己者死的長者。」

後來，父母親雙亡的父親拜謝為義父。

此時，一個名叫張則權的女孩出現了。她即我的母親。出生在上海市松江縣的母親，是家中獨女。她二十歲從體育專科學校畢業後，在一所小學做體育教員。女大當嫁。她因為不願意嫁給一個有錢人的兒子，就乘船逃離上海，隨船囤居漢口。此時，上海已被日軍占領。漢口與上海間水、陸路均被切斷，只有取道廣州經香港搭海輪回滬。一個女孩在兵荒馬亂的年月裡獨行是危險的。

父親受託護送母親往廣州和香港。母親對父親一見鍾情，父親也動了心。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他們在昆明舉行了婚禮。父親後稱這是一段上天恩賜的「奇緣」。

與死亡拔河

中國大半河山被日軍占領。重要的鐵路也已淪陷。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我在逃難地——廣東韶關出生。父親終日忙碌，母親神魂不安，忘記了我來臨世界的時刻。

當我八個月時，父親帶著我繼續逃難。我快兩歲時，伴隨父親工作的變動，全家遷到貴陽。

父親工作七年後，晉升為津浦路列車長，後擔任交通部材料轉運處專員。工作時時變動，戰爭的需要高於一切。為軍隊運輸武器、彈藥、汽油等軍用物資成為常態。

父親多次與死亡拔河：鐵軌被漢奸破壞，機車翻倒，兩人死亡，父親只受了點輕傷；二十六架轟炸機同時轟炸，並用機槍掃射，父親僥倖不死。看到一個背著孩子的女人，沿著鐵軌不要命地飛奔，孩子的頭已被彈片削掉，她卻一無所知；帶一

輛機車前往雲南保山，轉運從國外運入的交通電器材料等物資。父親看到的不僅是一座空城，而且是一座死城。他後來寫道：「被炸死的男女老小屍橫遍野。由於豬狗沒有人飼餵，便拖著人腿來充饑。」

赴美深造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清晨，我高舉著親自採摘的一束喇叭花，慶祝我家新成員的來臨：我的弟弟興國出生了。我每天都在盼弟弟快些長大，一同去花園裡摘大紅桃。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日、意軸心國敗局已定。美國為幫助中國培養一批戰後重建人才，從《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中撥出專款，從各部門通過考試選拔所需人才五百名，派赴美國實習。交通部有一百二十個名額，鐵道運輸系統分到二十六人。父親赴美實習的夢想實現了。

父親分配在東海岸Seaboard Airline Railroad。該鐵路線貫穿美國六個州，長達萬餘公里，共有六人在此實習。因為父親成績優異，經鐵路公司負責人推薦，父親加入了《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ailroad Superintendents）成為會員。這是美國鐵路管理方面最負盛譽的組織，已超過百年歷

史的國際性學術團體，會員資格限定於某一級別以上的領導人。除了父親，中國還有一位會員。

一年實習期滿。回國之前，父親向該公司運輸部總處長辭行，握手話別時，總處長對他說：「你回國後，將來一定會當部長。」

那位總處長說對了，交通部長是父親進取的目標。

生命的頂點

二戰結束後，我的全家遷到上海。

我在一九四六年春天背著書包上學堂。

此時，父親在等待交通部分配工作。父親選下鐵路運輸作為終生事業。在參加考選出國填表時，表上三個志願，他一無例外都填鐵道運輸。但世事非父親所能左右。他被派到首都南京市公共汽車管理處任處長，後任南京市鐵路管理處長。父親回國的第二年秋天，我的二弟安邦出生了。

一九四七年冬，任廣東建設廳廳長的謝文龍公公來信告知父親，宋子文繼任廣東省主席，要他兼任廣東省實業公司董事長。謝希望父親出任該實業公司顧問兼順德糖廠廠長。順德糖廠是除臺灣以外國內最大的糖廠，全部是德國進口的自動化設備，是廣東省實業公司屬下首屈一指的企业，也是省政府不可多得的堅實的經濟後盾，每屆省主席都任命自己最信得過的人主持。於是，父親前往市府向祕書陳述去

意，請他們準備適當人選接替，但得到的答覆是不同意。不久，謝來電囑父親立即赴粵就任。父親正式遞交辭呈，沈怡市長批示「倚畀正殷，不准所請」。父親第三次再見沈市長，結果還是不讓走。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時，父親作為首都各部、處的局長、處長之一，前往國民大會堂參加蔣中正第一屆總統的就職盛典。隨後，他以南京市處長的身分，去總統府禮堂參加只有二百人出席的、與總統相對三鞠躬的觀賀儀式。躬臨盛會的，都是黨國要人一時之後。

父親沒想到這已是他生命的頂點。

鐵路運輸是我的事業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國民政府搖搖欲墜。

南京作戰時部署，父親於兩個月後卸任。全家搬回上海。南京出生的三弟治平，剛滿四個月。離開南京前，父親函告謝文龍公公。謝立即寄來路費，叫父親仍去實業公司任顧問，兼順德糖廠廠長之職。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政府朝不保夕。京滬一帶的各色人等，紛紛逃往香港、臺灣或者更遠的地方逃避赤禍。父親已託人代訂船位，全家正等候南下。

此時，父親收到一封信，內稱成渝鐵路要通一段車，籌備成立運輸處。鄧益光局長邀請父親去任該處處長。父親立即覆信，說明謝邀他在先，不能爽約。鄧第二封來信，要父親等在上海，他馬上來滬面談，謝處由他與之商榷。未幾，謝來信，為了讓父親學以致用發揮專長，同意他去成渝鐵路。鄧怕夜長夢多，來到上海，親自去航空公司找董事長，逼其設法弄到六人機票。鄧還給了父親若干安家費後，命

其飛赴重慶。

母親從交通便利和環境安全方面考量，認為還是去廣州好。父親請求母親聽他安排：「鐵路運輸是我的本行，是我的事業。」

於是，全家人乘機離滬。到四川邊境時，由於飛機飛得太高，懷孕的母親和四個月大的三弟，被送進醫務室輸氧。從不生病的父親，在飛機飛過江西上空時，突然發冷逐步加劇，繼而發燒打抖難以支持。到重慶上空，濃霧鎖城無法降落，只得飛到成都打個彎，才又折回來。等候在機場的小車，不是把我們送去寓所，而是直接把父親送進了醫院。惡性瘧疾，住院、轉院、療養。這是一種災難的預示。

成渝鐵路由法國銀團投資修建。由於國共戰爭原因，時建時停。父親到重慶時，戰局已急轉直下。共軍截斷了漢口水路，機車無法運達。

父親無所施展，當一名空頭掛名處長。

總務處長簡玄素問鄧益光：「通車尚無把握，為何因人設事，急於弄齊尊周來渝。」

鄧益光答：「他如果去了別處，我就要不過來了。」

來到重慶後，由於法幣一日數貶，養家成了困難。

父親只能變賣母親的首飾過活，甚至連祖母留給他、保存了二十多年的唯一紀念品——一只小金戒指也被迫變賣。父親說：「娘呀娘，不孝之子到如此程度，我對妳不起矣。」

我是無懈可擊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陷入中共之手。五月二十七日，上海陷落。十月十九日，四弟大同來到人世。他是家裡最小的孩子。

決定命運的時刻來了。

十月中旬一個晚上，鄧益光與父親祕談。鄧對父親說：「是我逼你到重慶來的。現在局勢危急，我不能留下來，立即要走。你走不走？」

父親回答：「我兩袖清風，一家七口，生活怎麼辦？」

鄧答：「你不必擔心，你的家我負全責。我們到香港做生意，成渝鐵路的資金全在我手上。」

父親認為，自己學有專長，共產黨建立政權，也需要技術人才。他決定留下來。與此同時，他還拒絕了去臺灣擔任交通部路政司代理司長的邀請，以及去柬埔寨做生意的機會。

父親從新聞報紙上看到過關於中共殘暴無情的文字，但他認為那是國民政府對中共的宣傳戰。即使新政權真的可怕，也不會落到他的頭上來，「因為我是無懈可擊的」。

父親報國的赤誠之心，體現在孩子們的身上。四個兒子名字為：興國、安邦、治平、大同。五個孩子小名為：貞、忠、仁、信、和。

三十年後，滿身創痛的父親，堅信自己愛國無罪。他說，如果時間可以倒流，他「仍然會作出堅留大陸的決定」。但他繼之哽咽著說：「當時我才三十七歲，我想留在大陸為國家和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啊。」

跟著毛澤東走

我家起初住在李子壩一座小洋樓裡，房間寬敞又漂亮。

不久，搬到兩路口國際新村一號鐵路局宿舍。宿舍是兩層樓，共四十個房間，每間十五平方米，住一家人。家門對家門，中間狹窄黝黑的過道貫通首尾。這幢巨大的火柴匣式的樓房，坐落在浮圖關餘脈的山丘頂上。街道在半山腳，需從家門口下一百多級石梯。我們七口住樓下外側倒數第二間，四家人共用的廚房在後院天井，一個竹篾蓆搭成的簡棚。

十一月三十日，重慶陷落。共軍進入重慶——西南最大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全民慶祝新生活的來臨。

父親回到家裡，要母親同他跳舞。母親忍不住笑：「你瘋了？這裡怎麼跳。我正在做飯。」

父親把飯桌推到邊上，抱起一把木椅同它跳起來。進進退退，轉一個圓圈，

再轉一個，好像真的在同母親跳舞。他噉起歌唱家才有的口形，用他並不很準的嗓音高歌：「走，跟著毛澤東走。走，跟著毛澤東走。我們要的是民族的獨立，決不跟美帝做洋奴。我們要的是生存和自由，決不把生命當糞土。走，跟著毛澤東走。走，跟著毛澤東走。五萬萬個人，十萬萬隻手。高高舉起鋼鐵般的拳頭，打倒賣國賊，打倒吃人的野獸。還我們的血，還我們的肉，二十多年血海深仇，再不能保留，再不能保留。走走走，跟著毛澤東走，消滅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獨立民主自由幸福的前程，就在我們的前頭。」

五個孩子被眼前的父親深深吸引，拍手歡呼，扭屁股伸膀子，亂蹦亂跳湊熱鬧。父親不理我們，他一本正經，目不斜視，非常投入，完完全全地沉醉其中。

父親慶幸自己作出了堅留大陸的正確抉擇。他和母親以及五個在不同地方——韶關、貴陽、上海、南京、重慶出生的孩子們，終於尋到了安定的光明的環境。只要「跟著毛澤東走」，他就能竭盡全力為新中國奉獻終身了。

父親說，他「出頭」的日子到了。

脫胎換骨

然而，好日子卻到頭了。

重慶鐵路局升格為西南鐵路局。父親的職務從處長變為科長，並沒降級。但生活水準驟然下降，黑麵粉、糙米、牙膏、肥皂、草紙等生活物資按人口計領。

中共奪權後不久，鐵路局代表劉軍召開上千人的全體職員大會，當他講到「國民黨的官吏沒有一個不貪污的」時，父親立即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反駁道：「劉軍代表，你講的不是事實！」他指著自己的鼻子：「我齊尊周就一分錢也沒有貪污過！」

但毛主席可不像父親這般認為，在他眼裡，所有為舊政權服務過的人都是敲骨吸髓的害人蟲。毛要為自己的新政權打掃「政治衛生」。於是，他發動了建政後的

第一場血腥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¹。很快，鐵路局由軍代表接管，並成立了一個學習班，把原國民政府工作人員調去，美其名曰「學習」，其實是徹底交待歷史。父親也去了，他不僅不反感，反而很高興，認為「知人不易」，通過自己徹底的毫無保留的交待，讓鐵路局完全瞭解自己，這是好事。

父親的苦日子開始了。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一日，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成立。這是為國家建設服務而培養人才的黨校性質學校。各單位、機構送去許多留用的原國民政府工作人員。父親要求去學習，鐵路局拒絕保送他。但父親自己去了，一邊刻苦學習，一邊髒累活搶著幹。

父親每週回家一次，每次總是充滿朝氣，興高采烈。但入校兩個月後，父親心裡開始有了陰影。他發現學校是專門用來逼迫人交待歷史的。他不怕，因為自己

1 鎮壓反革命運動，指毛澤東清除政權敵對者，於一九五零年初，親自主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清查和鎮壓異己分子的大規模血腥運動。鎮壓主要針對中華民國政府官員、特工、傳統會黨、幫派、土匪等人，具體方式包括處決、勞改、送監等。中共採取戰爭方式，按照人口比例，夜裡抓人，白天槍斃，有的地方甚至展開殺人競賽。一九五四年一月，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的報告稱：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間，全國共逮捕二百六十二萬餘人，其中處決七十一萬二千人、關押一百二十九萬餘人、管制一百二十萬餘人。

的歷史清白。但校方利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小組幫助」的名義，用集體的力量強迫每個人交待，並且毫無根據地否認別人的誠實，肆意地侮辱人格。父親說到自己過去半生清廉自守時，小組人說他不老實。不老實就有問題，有問題就應當再追逼。父親對這種做法很反感：「我的歷史，你怎麼知道，憑什麼說我不老實？」

後來，父親想明白了：原來鐵路局不肯保送父親去，是因為他們早就通過辦學習班的方式，令父親「徹底的毫無保留的交待」，對他瞭若指掌了。父親自己交待的歷史，竟然成了自己的罪證。

鐵路還沒通車。無事可幹，全體職工上午上班，下午在家避暑。

父親應重慶大學之聘，委任學校鐵道運輸系教授，每週上兩節課。父親每日下午照常去辦公室，閱讀鐵路運輸理論書籍，在業務上充實提高自己，為學生備課。

此時，我唸完四年級上期，數學不及格。父親每天下午帶我去他上班的地方，為我輔導數學。我的那個暑假被父親沒收了一半。但我從此對數學產生了興趣，成為我最好的一門功課。除了學習外，我還喜歡畫美女。

我在九歲時當上了學生會文娛部長。做了大官，也不影響我的自由和快樂。

母親的戰爭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清晨，我和父親一起離家。分手前，我向他要一角錢，放學後去紅星電影院看蘇聯影片《他們有祖國》。前天是我的十歲生日，借此優待一下我自己。走出電影院後，我仍然感動不已，為那些回到祖國懷抱的孩子，為蘇聯政府不懈的努力。

回到家，天已黑。四個弟弟都睡著了。母親雙手扶著床頭，臉埋在手裡。父親的生活極其規律，按時上班，準時歸家，從不晚上出門。為什麼今晚不在家？我奇怪地問：「媽咪，爹爹呢？」母親抬起淚臉，沒講話，只遞給我一張字條。

紙條是父親單位的人帶來的，上面是父親的留言。請母親把他的日用必需品交給來人，並查收帶回的懷錶和皮鞋。「組織上為了弄清我過去的歷史，暫時不讓我回家。你不要耽心，弄清楚我的過去，就能更好地信用我，這是好事。」

父親此次是在軍管會學習班交代歷史問題。

鐵路局私設監獄，禁閉父親一年零七個月。

我們每天都盼望父親歸來。但過了一個春節，父親還沒消息。母親沉默寡言，很少在我們面前提及父親，她希望我們過正常的生活。但是對於她自己，一個長期受丈夫保護的女人，我們五個嗷嗷待哺的弱小生命，在她的羽翼下生活。

春天時，大弟興國開始上學了。我倆每天背著書包一起去一起回。

鐵路局把父親拘禁以後，既不知道家屬他在哪裡，也不解釋為什麼關押，更談不上何時家屬可以探視。無來自父親的片言隻語。他好像已被人從地球上抹掉。更要命的是，起初鐵路局說是帶薪學習，沒多久竟藉口鐵路局入不敷出、經濟困難而停發了工資，我們一家六口要斷飯了。

亨中舅舅從上海寄來了一些錢和一些舊衣服，還有一架「蝴蝶牌」縫紉機。這架縫紉機是我的乾爹葉宏材送的，他希望母親自力更生，靠別人接濟不是長久之計。

屋漏偏逢連夜雨。兩個月後的一天清晨，母親的雙手突然不能動彈了，手指和腕關節不能彎曲。母親病急亂投醫，吃了藥，不管用。一個鐵路人員家屬建議母親試試西德出的「亞陀方」。吃了兩瓶藥，母親康復了。

母親康復了，四弟卻生病了。醫生查出患的是小兒疳積病。三天兩頭進城抓藥，兩個月後才康復。父親送給母親三大禮物：鑽戒、海復絨大衣、浪琴手錶。海復絨大衣早已賣掉，這次連鑽戒也賣了。

毛主席在看著妳

終於有父親的消息了。

父親失蹤後，學校似乎不知道。我的日子過得快活，直到一九五一年秋天。

這天下午，正在上課。我被三男一女叫到隊部。巨大的毛主席油畫像占了整整一堵牆壁，一幅少年兒童隊隊旗掛在另一堵牆上。這三男一女都很年輕，穿著一樣的深藏藍嘜鐵路制服，女的頭髮有點自然卷。

「自然卷」和顏悅色地同我說話，引誘我說出他們想要的話。

她問：「妳是不是少兒隊員呀？」

我答：「是的，是學校第一批宣誓入隊的。」

她問：「妳想不想做個好隊員呀？」

我答：「是的，我天天戴紅領巾，從來不忘記。」

她指著毛主席的像又問：「妳熱不熱愛毛主席呀？」

那還用問，我心裡對毛主席熱愛尊敬得要命。

「很好！」她誇獎我。接著：「妳願不願意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呢？」

當然，我天天都想。

她話鋒一轉，問：「想不想妳的爸爸？」

我答：「我想。」

「妳知道妳爸爸現在在哪裡嗎？」

我心情黯淡下來：「不知道。」

「妳知道妳爸爸為什麼不能回家嗎？」

我不知道。想起爹爹這麼久沒回家，我有點想哭了。

她把身子朝前傾，離我更近，眼睛盯著我的眼睛說：「妳的爸爸貪污了。」

貪污？我望望坐在一旁的另外三個男人，他們的表情是肯定的。說不出為什麼，我的眼淚開始湧出來。

一個男的說：「妳爸爸的貪污罪行很嚴重，他貪污了公家的銀元。妳看見過沒有？」

我既不能相信父親貪污，也不能相信他們是在撒謊。對大人，特別是陌生的大人，我有一種本能的畏懼，從來如此。我一臉茫然，不知回答什麼好。此時，我哭

了起來。

那個男的接著講：「妳爸爸貪污的銀元很多很多，是一個大箱子裝的。」

我儘量把眼淚眨回去，輕輕地問：「大箱子有多大？」

「有飯桌子那麼大。」他答。

「像我屋頭的那個飯桌呀？」

「噢。」他點頭。

我家那張桌子很大，可以坐八個人吃飯，這麼大的箱子，我可從來沒見過。父親去美國的那兩口鐵皮箱子，上面嵌著他中、英文名字的名片，還用油漆寫地址在箱面上，比桌子小得多，而且裡面全是衣物，我最愛看稀奇，早就透底翻過了。

「自然卷」發問：「妳見過那個箱子嗎？」

我搖搖頭：「沒有。」

「沒有？」一個男的鼓大眼睛瞪著我，我覺得害怕。我不願意別人說我撒謊不相信我，不願意別人說我不是好孩子，更不願意別人說我不願意當毛主席的好學生。我非常想給他們最好的答案，使他們高興滿意，就像課堂上回答老師的問題，我極力想拿好分數，自己也得意。但是這麼大的箱子，我真的沒見過。

見我哭泣，「自然卷」和氣地問我：「妳不想妳的爸爸回家？」

我使勁點頭。

她說：「妳爸爸很不老實。他不肯交待自己的貪污罪行，所以還不准他回家。現在妳可以幫他的忙，」她頓了一頓，接著說：「如果妳幫爸爸把問題說清楚，就等於是他自己坦白交待了。那麼，我們現在就帶妳一起去看妳的爸爸。妳爸爸揹起鋪蓋卷，牽著妳的手，馬上跟妳一路回家。」

經她如此形象地描繪，我的腦海裡已出現一幅和爹爹手牽手回家的圖畫了。我多麼想念他呀。

我抬起淚眼望著她，心想：「我可以幫爹爹的忙？」

「怎麼樣？現在就看妳了，只有妳才能幫助妳的爸爸。」

女人的聲音，使我返回到隊部辦公室，想起了他們提到的一大箱銀元。

我無可奈何地回答：「我不曉得。」

一個男的說：「妳看，毛主席在看著妳，妳應當誠實。」

我看了一眼毛主席慈祥的笑臉，心裡難過極了。我說：「我真的不曉得。」

另一個男的叫我再好好地想一想。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好好地想一想還是不知道。我不明白他們說的誠實是什麼意思。

他們冷冷地等著我，好像剛才我在撒謊，現在要我講真話。我委曲極了，哭出聲來。我覺得我像個做了壞事的小犯人，正在受審。

下課鈴響了。

我用滿含淚水的眼睛，哀求他們開恩放我走。這樣我就可以混進湧出教室的同學，和他們一起在操場集合，再一隊一隊走出校門，誰也看不到剛才在隊部發生的那一幕，誰也不知道我哭過。但是，他們完全沒這個意思。他們似乎故意要拖到這一刻。

我坐的位置，左面是毛主席的巨幅畫像，右面是窗戶。操場上的同學、老師們，透過窗戶，一眼就能看清我。我不願意他們看到這個唱歌大王、跳舞大王在受審，在哭泣，在出醜。

我把頭埋得很低很低，恨不得蹲在地上。

「自然卷」打破冷場說：「妳看，這麼多同學看著妳。」她也注意到這點，「妳應當做個好榜樣。」

一個男的接著說：「妳還說要當毛主席的好兒童隊員，連這麼一件事都不承認。」

我低頭飲泣。他們一言不發，看我哭。操場上的同學開始一隊一隊往外走。外面的人走沒了，這幾個人相互咬了幾句耳朵。

「自然卷」開口說：「現在時間不早了，妳回家仔細回憶回憶，明天我們再

談。」

出了隊部，我坐在操場的花圃旁等一會才走，現在出去還可能碰到同學。

弟弟興國跟著隊伍出去了又折回來，他坐在旁邊等我。我倆一路沉默地走回家。

回到家，我才知道，上午已有六個人到家裡逼母親交待了。

「怪不得那個男的曉得我家的桌子有好大。」我想。

母親說：「他們說齊尊周貪污的銀元是交給我的。真滑稽，我這輩子不要說有，就是看也沒看到過這麼大一箱子的銀元。」

在廚房裡，母親指著我對謝媽媽說：「妳看看，這些人有沒道理，連十歲的小孩都不放過。」

謝媽媽住我家隔壁，兩家人在一個廚房做飯。她對母親很好，我看見她倆常常有說有笑的。她的孩子謝文、謝武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第二天下午，這三男一女繼續引誘我說出他們想要的話。

我哭，我說不知道。

他們交給我一個新任務：「妳的媽媽態度很頑固狡滑，妳回去要好好幫助她，

這樣對抗下去，會影響妳爸爸。」

我已昏頭昏腦，弄不清是他們對，還是母親對了。回到家，我對母親說：「媽咪，妳就坦白交待，不要再頑抗了吧。」

母親生氣地反問：「每天早上六個人來逼我還不夠，妳也來逼我了。沒有的事，我怎麼交待啊？」

半夜，我看見母親把衣櫃打開，鬼鬼崇崇地轉過臉看看有沒人，慌慌張張地把銀元拚命往裡塞。第二天清早，我迷糊了，弄不清是真有其事還是夢中所見。趁媽媽不在，我上下左右搜查櫃子，什麼也沒搜查到。晚上我惡夢連連，白天我頭痛欲裂。

兩週的引誘之後，我的神經臨近崩潰。我願意做任何他們要我做的事情，只要他們放過我，不要再來。

他們給了我機會。

那個裝銀元的箱子越說越小，從大方桌那麼大說到大箱子，從大箱子說到小箱子，從小箱子說到肥皂箱那麼大。

提起肥皂箱，有了。父親過去的鐵路老同事張春元，那時在什麼油脂公司工

作，父親託他買過一箱黑貓肥皂送到辦公室，工友老許把它送到我家裡。我知道那是一木箱肥皂，每塊肥皂上面包有一層印有黑貓商標的薄紙，我替母親拿過。管不到那麼多，他們要我「誠實」。

我說：「是的，有這回事，肥皂箱子裡面裝滿了銀元，是老許送到我家的。」這幫人喜出望外，苦戰終於有了成果。他們要我將這件事寫下來，對我講話客氣了不少，我感到舒暢。

我拿起筆像寫作文，「……老許把一肥皂箱銀元送到我家時，滿頭大汗，媽媽叫我打盆水給他洗臉，還給他倒了一杯冷開水……」

他們看了一遍，叫我寫上名字和日期。

最後，「自然卷」說：「妳在上面蓋個指紋。」

我惶恐地望著她，不明白她講的是什麼意思。

她帶我到教師的大辦公室裡，多數教師還沒下班。「自然卷」一隻手託著借來的印泥，另一隻手捉住我右手的大拇指，當著眾人的面蘸一下印泥，在我寫的紙上摁下去。

他們拿著那張紙，臉上露出笑容，開心地走了。他們忘記了他們的許諾——帶我去見我的父親，然後一起回家。

從此，他們放我過關，每天下午我不必再提心吊膽。

我好了。但他們加劇了對母親的逼迫。

六個人輪番咒罵：「狡猾的狐狸精」、「陰險的女人」、「收了銀元不肯吐」、「拒不坦白，死路一條」、「想想妳的五個娃兒，捨不捨得丟下他們」、「妳的女兒齊家貞都檢舉你了，妳還在抗拒」。

最後，他們甚至說：「齊尊周都坦白了，妳還包庇。搞得不好，他放出來，妳又進去了。」

母親神情安詳，回答始終如一：「黨的政策是實事求是。沒有的事，我不能亂說。齊家貞檢舉也好，齊尊周坦白也好，那是他們的事。我確實不知道。」

母親沒責備我無中生有寫檢舉，甚至沒對我提及。